

“剑桥学派”的史学方法与激进民主

○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剑桥学派”虽然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崛起的思想史研究学派,但在英美学界的影响辐射力迄今仍然相当强势。“剑桥学派”提出的思想史方法论范式,即“让文本返回它最初的写作语境”,看起来非常学术化,即强调作为历史研究的思想史研究的客观性。其实,“剑桥学派”并非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学派,毋宁说,它首先是当代西方学界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一支。“剑桥学派”所提倡的思想史方法范式本身,就具有激进民主性质。其代表人物波考克和斯金纳的史学方法论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先颠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用新的史学方法取而代之,才能顺应时代的激进民主潮流。“剑桥学派”让思想史研究变成了激进民主政治论的场域,值得我们保持警惕。

〔关键词〕“剑桥学派”;波考克;斯金纳;思想史方法论;激进民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6.003

1975 年,“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波考克(John G. A. Pocock)出版了《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作者时年 51 岁。^[1]这部大著在 2013 年译成中文。1978 年,时年 38 岁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2]随后,波考克和斯金纳的大著双双被视为如今声誉显赫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扛鼎之作:《马基雅维利时刻》甚至被视为这个学派的“史学写作方法的示范”。^[3]

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已经有了两个中译本,我们以为,此书提供

作者简介:刘小枫,《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1978 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修习德语文学,1982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1985 年起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1986 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 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 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创立大型译丛“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发表《现代性社会理

了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详实且客观的描述。其实,与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一样,斯金纳的这部思想史同样是在力图通过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论证“公民共和主义”政治理念的正当性。斯金纳曾谦虚地说,“剑桥学派”诞生的标志是邓恩(John Dunn)在1969年出版的《洛克的政治思想:对〈政府论〉的一种历史解释》。^[4]但“波考克超越了所有人”,“引导我们开始思考政治理论史并非仅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更广泛地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语言”。^[5]事实上,波考克、斯金纳、邓恩堪称“剑桥学派”的三剑客,波考克年长斯金纳和邓恩十多岁,但斯金纳的名气与波考克相比不遑多让。^[6]

如果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树立了“剑桥学派”的“史学写作方法的示范”,那么,这种“示范”显明的是怎样的“史学写作方法”呢?

一、“剑桥学派”的兴起与激进革命年代

1971年,正在精心写作《马基雅维利时刻》的波考克出版了一部自选文集,题为《政治学、语言和时间:政治思想与史学论集》,^[7]时年波考克47岁。文集共收八篇文章,其中六篇系旧文,置于篇首的《语言及其含义: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和置于末尾的《论诸范式的非革命性特性》是为这部文集新写的,均涉及史学理论的性质和方法论问题。^[8]《语言及其含义》一文详细阐述了《马基雅维利时刻》所采用的“史学写作”方法,还预告了这部正在写作中的“优秀作品”的主题:它要勾勒“从佛罗伦萨到英国直至美国语境的整个变迁历程的方方面面”。^[9]波考克说,“在方法论仍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优秀作品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机遇,或者要看德性与机运的巧合”。^[10]如果可以把《马基雅维利时刻》视为“优秀作品”的话,那么,它的产生取决于何种“机遇”,或者说,波考克自己的“德性与机运的巧合”是怎样的呢?

《语言及其含义: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一文开篇就说:“在过去十年里”,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学界发生了一场“革命”。按该文写作时间推算,所谓“过去十年”指1960年至1970年,与我们经历过的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历史时刻大致同时。按著名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家佩特曼勾勒的发展线索,“激进民主”理论形成于1954年至1966年间,^[11]因此,波考克所说的这场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革命”动向,承接的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激进民主理论。波考克让我们注意到,分析哲学用“语言分析摧毁政治哲学”,也为这场“革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到1956年创刊的《哲学、政治学与社会》丛刊,^[12]则让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950—1960年代,西方学界陆续出现了各种带有激进政治取

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在学界之影响广泛而深远。2002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创立“经典与解释”辑刊及大型译丛“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发表《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标路》等著,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2009年起迄今,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责任教授,发表《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共和与经纶》《设计共和》《比较古典学发凡》《古典学与古今之争》《柏拉图四书》等,为开拓古典学研究贡献卓著。

向的学术辑刊。

波考克说,由于“革命”这个语词在这一时期“使用过于频繁”,他宁可用“剧烈变化”“变革”或“转型”(transformation)来界定这场“十年”学界动荡。波考克还告诉我们,史学家和哲学家“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虽然政治理论、文学批评乃至社会学等学科“也被卷入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型”是“史学与哲学的结合方式”。波考克说,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这一转型”,因此希望通过眼下这部文集揭示这场学界“革命”的性质。^[13]其实,波考克并非仅仅在“一直关注这一转型”,早在1965年至1969年间,他就与当时年仅20多岁的斯金纳一起热情投身于这场政治思想的“革命”。历史的巧合是,当时我国的“文革”正处于疾风暴雨时刻。波考克在1965年发表《马基雅维利、哈灵顿与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意识形态》,1968年发表《公民人文主义及其在盎格鲁——美利坚思想中的作用》;^[14]斯金纳则在1965年至1966年间发表了两篇关于英国共和革命时期的思想史论文,以及一篇关于思想史方法论的论文。

波考克在1970年撰写此文时清楚意识到,这场思想“革命”没有结束,或者说“革命”尚未成功,他明显企望用自己的这部文集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直到把“革命”进行到底。事实上,这部文集也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革命”作用:文集问世后,仅仅在70年代就两次重印(1974年和1978年),至1989年印行5版,那时,“革命”终于显见成效。如果罗蒂说得没错,美国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为激烈的斗争时期是1964至1972年间,^[15]那么,波考克和斯金纳都恰好在关键时刻投身这场“革命”运动。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得有“革命对象”。不言而喻,社会革命的对象是旧的政治体制,而政治思想的革命对象是旧的思想观念。波考克把这场政治思想的革命对象说成一般而言的“方法论或叙述手段”,我们切莫以为,他针对的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性问题,毋宁说,他要谈论的是类似于“文化革命”的问题。波考克紧接着就把“以往”的以研究历代“正典”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传统”直接称之为“混乱”:政治思想领域晚近“十年”来的革命不是“混乱”,基于研读历代经典的“学术传统”反倒是“混乱”。波考克甚至说,经过近十年“革命”,如今才终于“隐隐约约出现了一种有关‘古典传统的崩溃’的言论”。^[16]

由此我们得知,波考克参与的这场政治思想“革命”所针对的革命对象是“古典传统”。波考克所谓的政治思想领域的“转型”或“变革”听起来很学术化,其实,用我们熟悉的语汇来说就是破旧立新。事实上,波考克谈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所谓“范式转换”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毋宁说,它事关如何从思想上彻底砸烂表征旧世界的“古典传统”,为迈向新的政治制度铺平道路。波考克在文中甚至用富有修辞色彩的笔调写到:“佛罗伦萨的外交官”和英国共和革命时期“从走廊向外窥视克伦威尔的士兵”的那个读书人,已经尝试这种破旧立新的史学写作。^[17]显然,波考克指的是马基雅维利和哈灵顿。不过,在波考克看来,由于这两位“人文主义者”受时代限制,其史学写作“用当代的语言重述古人和先辈的思

想,借以发现他们在当代问题上的主张”,以至于他们“宁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而不是行为科学那里了解政治”。波考克告诉我们,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这种做法显然过时了,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视为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不想再假装“从传统中提取概念框架,而宁愿建构自己的框架”^[18]。波考克显然指的是那些当时战斗在思想斗争第一线的哲学家们,他表示他自己不属于这类哲学家,因为他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史学家。尽管如此,波考克与这类激进哲学家站在同一战壕,享有共同的理想。出于专业训练上的原因,波考克要做的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闹“革命”,即掀起一场针对“古典传统”的史学“革命”。据说,过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把传统转化为史学”,如果要让激进哲学进入思想史研究,就必须纠正“史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失调”,通过新的研究方法让史学为“古典传统”的彻底崩溃扫清道路。

波考克首先抨击思想史研究中的“连贯性”观念,即否认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传统或某个经典作家的思想具有“连贯性”。波考克说,思想史研究在这种虚拟的“连贯性”观念支配下解释历史上的历代经典,“都可能是非史学的陈述。”^[19]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的所谓“连贯性”观念,为的是打破“古典传统”迄今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霸权。毕竟,“传统”这个观念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连贯性”。换言之,波考克让自己的“革命”思想披上“纯学术”的外衣,以追求真正的“史学”的名义向以研读经典为基础的“学术传统”发难,让人以为他捣毁“古典传统”完全凭靠的是一个单纯学究式的理由:过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根本没有搞清楚何谓真正需要去研究的“历史现象”。他宣称,他自己所发明的“一种真正独立的方法”,才能“将政治思想现象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现象,而且,由于历史涉及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政治思想现象甚至被视为历史事件”^[20]。

幽灵依然在战场上徘徊;我们仍然要认真地提出如下问题:政治思想史是否包括研究古典文本或某些恒久的问题,是否要在唯心论与唯物论解释之间进行选择。但我们已经看到曙光;我们业已强调指出,先前的迷惑很大程度上源自史学家和哲学家职责上的混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分析是一种推动力,它促使史学家寻找自己特有的方法。^[21]

凭靠这个理由,波考克甚至质疑,“政治哲学这样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过,哲学家的事务是否应当仅仅局限于探索和澄清那些由他人在某些具有政治性的主题上的论述。”^[22]可见,波考克不仅要求搞史学的改弦更张,而且要求搞哲学的也得改弦更张。换言之,波考克的革命气魄不可谓不小:他不仅要重新定义何谓“历史”以及“史学”,还要重新定义何谓“哲学”。

二、何谓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史学家以及哲学家应该怎样改弦更张呢?在1970年这个疾风暴雨的历史时刻,波考克首先提到库恩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及其历史转换的论说,称其为这场思想“革命”已经取得的“最有价值的贡

献”。不过,波考克随后仅仅把“范式”概念用作盛装自己的革命性思想的箩筐。^[23]“剧烈变化”或“变革”也好,“转型”或“革命”也罢,都可以称为“范式转换”,问题在于:从何种“范式”转向何种“范式”?如果说按照“学术传统”,历代经典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取代这一“范式”的基本对象是什么呢?波考克告诉我们,是“社会语境及其历史具体性”,或者说“概念世界与社会领域互为文脉(context)”的语言系统。由于这个系统“也可被视为一种历史事件”,亦即“概念世界与社会领域”相互作用的历史“时刻”,它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对象。^[24]换言之,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哲学或研究思想史是阅读历代经典,那么,经过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学习哲学或研究思想史就应该把目光转向“社会语境及其历史具体性”,关注“概念世界与社会领域”相互作用的历史“时刻”。

波考克强调,“范式”概念包含政治性的“权威”含义。这无异于告诉我们:按照过去的“学术传统”,对学人共同体具有统治“权威”的是“古典传统”,经过革命性的“范式转换”之后,具有统治“权威”的应该是“社会语境及其历史具体性”或历史“时刻”。学人共同体虽然仅仅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社会领域中诸多共同体的某一类共同体,但是,唯有这个共同体掌握着“概念世界”。因此,所谓“概念世界与社会领域”的相互作用,指的是学人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在共同体的语境下思想”。这意味着,政治思想家甚至热爱智慧者(哲人)都得用自己的“同胞公民公开认可的价值和权威范式”与政治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交流——波考克甚至说,苏格拉底就是如此。^[25]我们看到,如果说古典政治哲学强调热爱智慧者与常人的差异,波考克的“范式转换”首先要求热爱智慧者改弦更张的是:学人应该与普通公民看齐。

波考克在这里首先充当的是哲学家的角色,因为他明显是在借用分析哲学的语言理论来建构一种他所理解的社会实在或历史现实——他称之为“政治言说”(political speech)所构成的实在。因为,“修辞尤其是政治修辞的目的在于调和那些从事不同活动、有着不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语境及其历史具体性”中,“一种言说往往同时发挥着多种语言功能”。^[26]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政治结构”必须被理解为即时性的“政治言说”,而这种“有着复杂修辞的言说在语义上有着复杂的历史”。^[27]凭靠这种对“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政治结构”的理解,波考克提出了“改变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关系”的诉求,其要点在于:“哲学只不过是专业思想活动的一部分,它源自语言的讨论和探索,而这种语言正是政治得以清晰表述的载体”。^[28]

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复杂和多元的,每一种专门化的语言都在权威的范围和配置方面具有自己的倾向,由这样的语言构成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一种高度复杂的语言,在其中,许多范式性的结构同时并存,它们彼此之间始终存在冲突,每个术语和概念时常从一种结构转移到另一种结构,某些含义被改变,而另一些含义则得以保持。^[29]

在现实的学术语境中,某个思想者一旦擎起一面学术旗帜,马上会受到学人

共同体关注,甚至吸引学人追随。更为重要的是,如波考克所说,思想者的“言说”行动还会形成一种具有“权威”的范式。如果我们自己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学人”或进入学人共同体,我们必须审视这类正在建立或已经建立的学术“范式”,而非不假思索地用来装备自己的头脑,进而用这种“范式”来想问题。当波考克凭靠分析哲学的语言理论来摧毁“学术传统”的“范式”并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时,我们首先获得的是一次学习思考的机会:通过对比两种学术“范式”,我们需要看清的首先是学人的德性。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语境中,林林种种的新理论层出不穷,波考克选取了分析哲学的语言理论,是他的个体性情的“德性与机运的巧合”的证明。波考克由此提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史学对象或“历史现实”应该是他所谓的“范式性的文本纹理”(paradigmatic texture),这既是“历史的实在”,也是“史学的实在”。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表述:历史上的某个政治言说“无法完全控制他人”对这种言说的理解。从而,任何政治言说或经典文本都“将会有一种多重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将包括某些关键时刻”^[30]。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意味着,从关注“古典传统”的经典转向关注历史上的政治言说或经典文本的“多重历史”或“时刻”。这不等于不再研读古传经典,毋宁说,如果要研读古传经典,我们无需费脑筋去思考文本作者的所思所想,而是从“范式性的文本纹理”来确认文本的“言说意涵”。如果说古传经典中有“恒久的问题”,那么,在“文本纹理”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问题统统不见了。毕竟,经典作家写下的文本“无法完全控制他人”对这种言说的理解。这让我们会想起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表达对成文言说不信任时所讲的道理,差异在于:苏格拉底担心的是思想者的文字进入杂众语境后会遭到曲解,波考克的意思则是,思想史研究应该按杂众的视界来理解思想者。所以他说,“研究某一思想家就是考察他借助语言的所作所为”,这意味着史学家的方法可以揭示这种“文本纹理”的“存在和性质”。^[31]

波考克进一步告诉我们,由于任何“文本纹理”都有“其经历的任何时刻,其所呈现的意涵和参与的历史都不止一种,我们只是被迫作出选择,并宣称我们就是选择那种我们觉得值得讲述的历史”。^[32]波考克让我们看到,他的哲学—史学观的理论资源,除了分析哲学的语言理论,还有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因此,思想史研究首先不是要思考历史上的思想者在思考什么,而是重构历史上的思想者“所处的范式情境(paradigm-situation)”——多元的政治语言处境,然后选择其中的某种“政治言说”,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至于我们从过去的历史语境或“范式文本纹理”中选择何种“政治言说”,则取决于我们当下在同样是多元的政治语言处境中的政治选择。用波考克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会认为,自己只是进行了上述那种历史重构,揭示了一种新的范式纹理,说明其以前曾存在过。我们会认为,自己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结构,它将意味着对作者思想的一种新的解释……^[33]

在论文结束前,波考克强硬地宣称:他不怕因此有人指责他是“唯心论”,或

指责他“在建立一种反形而上学”。若有人指责他“走向‘抽象化’”，他则会回答说，自己“所研究的正是抽象概念即系统性思维的历史”^[34]。的确，尽管波考克的这篇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论文写得委实颇为“抽象化”，但其基本主张并不难以理解：他不外乎提借用“历史语境”或所谓历史“时刻”取代“古典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地平线是各种历史“时刻”，今人有自己的历史“语境”或“时刻”，古人也有自己的历史“语境”或“时刻”。今人研读古书是为了解答今人身处的历史“时刻”所面临的问题，因此需要从自己的历史“时刻”出发去选择“我们觉得值得讲述的历史(时刻)”。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波考克自己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是：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特意选出一些段落”，以此构成其共和主义式“公民美德”论的基础——“做出决定时有平等的发言权”的政治平等，因为他“从这种亲密的平等中看到了所有关于公民美德的想象的基础”。当有人批评这种“史学方法”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断章取义时，波考克则回答说，“政治文本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方式，未必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整体性或系统化理解。^[35]

三、思想史如何破旧立新

在这篇关于方法论的论文中，波考克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他自己身处的革命性历史“时刻”与其提出的思想史研究新“范式”之间的关系。波考克发表这篇论文之前两年，斯金纳已经发表题为《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长达 50 页），与邓恩在同年出版的《洛克的政治思想》配成理论与实践的双刃剑，时年斯金纳才 29 岁。^[36]与波考克的文章一样，斯金纳在文章开篇就宣称：西方学术的如下“传统”将是他破旧立新的“革命”对象：

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书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涉及道德、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37]

波考克的文章在关于破除思想史研究中的“连续性”观念方面着墨不多，乃因为斯金纳在两年前发表的文章已经对这种观念详加辩驳。波考克的文章也很少指名道姓打击思想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这并非因为他厚道，而是因为斯金纳的文章已经几乎无一遗漏地指名道姓地批判了所有必须批判的前辈学者。表面看来，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是主要的批判对象，因为他在 1933 年出版的《存在的伟大链条：观念史研究》一书确立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式。^[38]实际上，斯金纳心里清楚，思想史学界“革命派”的最大敌人是施特劳斯，因为他说：施特劳斯尤其强调思想史研究“应当关注某些恒久的或至少传统的‘真正标准’”，“而且影响相当大”。^[39]斯金纳宣称，他的文章不仅要“质疑和批评”这种思想史研究的“预设”，而且要“使其名誉扫地”，以便让思想史研究转向，“去考察经典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或知识语境”。^[40]

斯金纳把思想史上有“恒久的”和“持久的”问题这样的学术传统“预设”称为

学术“神话”，并认为不破除这类“神话”就“根本无从(更不用说论证)将伦理或政治思想史描绘为或者说成是各种可辨认的活动的历史”。^[41]随后，他花了两节篇幅来破除以往的思想史家们“制造的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历数诸多前辈如何徒劳无功甚至可笑地“力图在经典文本中找寻自己所期待的某些学说”^[42]。据说，思想史的“连贯性”神话体现在两个方面：要么认为思想史上有某些从古到今都恒久不变的“问题”，这些问题把历史上的思想家串在了一起；要么认为历史上的某个思想大家在其一生中有某个连贯的思想主题。比如说，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就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串在了一起，然后再把他们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串在一起，并提出了应该思考的“恒久问题”。不仅如此，在研究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或卢梭时，施特劳斯也关注这些哲人在其一生中所思考的“恒久问题”。因此，在这篇显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檄文中，斯金纳特别提到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指责施特劳斯把马基雅维利视为“不道德的和非宗教的”思想家。斯金纳宣称，由于施特劳斯的研究“范式决定着整个史学研究的方向”，“只有抛弃这一范式本身，我们才能对历史重新作出诠释”。^[43]

斯金纳承认，“西方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哲学长期以来”具有连续性，这体现为“长期使用”“许多关键概念和论证模式”，但他宣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停止围绕这样的连续性的研究去组织我们的史学”。^[44]理由在于：

试图以是否能够为那些经典文本中所谓的“恒久问题”提供答案作为这一学科的基础，完全站不住脚，若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这一学科，我认为将使这一学科变得极其幼稚。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45]

年仅 29 岁的青年才俊说这种话，不知道“极其幼稚”的其实是自己，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我们读到的文本可不是斯金纳在 29 岁时发表的文本，而是 2003 年已经 60 多岁的他出版其三卷本文集时修订过的文本，还补充了 80 至 90 年代的文献。关于思想史研究应该转向，“去考察经典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或知识语境”的道理，与波考克两年后发表的文章相比，斯金纳的论述缺乏理论的“抽象化”深度，但他明确说到波考克没有说明的东西——思想史研究与 1960 年代的“革命”的现实相关性。

在我看来，经典文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经典文本的“相关性”和当下的哲学意义。……而且，与其他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同样也有自己的信仰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安排，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更为有益的视角。对这些观念的历史的把握，能够使我们知道自己常常接受的那些“永恒”真理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們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随机性结果。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形形色色

的概念。这一发现不仅关乎过去,而且是关乎我们自身的真理。^[46]

给这段宣言式的文字贴上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等等标签,都不会不贴切。不过,我们值得关心的不是贴诸如此类的标签,而是值得关心斯金纳说的“我们”是谁?无论是谁,总之是学人或愿意成为学人之人,否则,他研究思想史干什么呢?既然如此,斯金纳认为“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斯金纳提到,比如“投票和决策,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舆论在整个政治理论中的地位问题。在晚近的民主理论中,这些问题获得了核心地位,但在现代代议民主制建立之前,这样的问题则很少进入当时理论家们的视野”……又比如,“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被操纵在社会特权者手里这样的问题”,“对那些并不关心大众意志的理论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47]斯金纳还提到,“恒久问题”范式会严重误导思想史研究:比如,在理解和评价“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激进政治思想”时,“恒久问题”的思想史范式会“使得解释平等派意识形态的某些最主要的特点变得尤为困难”,激进平等派“对君主制的反感以及对宗教情感的诉求便显得无法理解”。^[48]这岂不是说,从60年代的革命性历史“语境”或“时刻”出发,学人应该成为17世纪中叶英国共和革命时期的激进平等派吗?

斯金纳让我们看到,他与波考克联手倡导的思想史研究“范式”还有第三个理论来源:激进民主的“公民共和主义”。这也就是波考克在其文章中所说的,“我们只是被迫作出选择,并宣称我们就是选择那种我们觉得值得讲述的历史”。在60年代末那个激进民主运动的历史“时刻”,“剑桥三剑客”——波考克和斯金纳以及邓恩——所推动的思想史研究的革命性“范式”转换,从性质上看,无异于让哲人的思想史转换为公民一常人的思想史。我们很难断定,“剑桥三剑客”究竟是自己从哲人心性转换成了公民心性,还是他们的天性就是常人心性。可以断定的是,在他们所倡导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引领下,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仅会呈现为一派激进民主景象,而且会把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培育成激进民主人士。

四、余论:“剑桥学派”的革命理想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在波考克和斯金纳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中,为何从未出现过马基雅维利与色诺芬的关系问题。色诺芬既是政治人又是哲人,既追求沉思德性也追求实践德性,从而是马基雅维利的最大绊脚石。因此,为了详尽地反驳古典传统,色诺芬是马基雅维利在其政治史学中关于古典德性的传统来源“举出的唯一例证”。不仅如此,在马基雅维利时代,色诺芬也是当时很多人文主义者最喜爱的古典作家。无论就马基雅维利与色诺芬的关系而言,还是色诺芬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而言,如果波考克和斯金纳要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来反驳古典传统,都得面对色诺芬。可是,在波考克和斯金纳那里,这块最大的绊脚石被他们凭靠当下的历史“时刻”或“语境”所重构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时刻”或“语境”彻底屏蔽。^[49]如果谁研究马基雅维利时揪住君主问题不放,波考克和斯金纳就会说,这种研究不是真正的史学研究,方法上大

有问题。毕竟，马基雅维利所考虑的君主德性，是马基雅维利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由于波考克和斯金纳面临的“问题”是“参与式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们便致力于重构马基雅维利的“范式性文本纹理”。

由此来看，如果说“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反“传统”，那就错了。毋宁说，“剑桥学派”反的仅是“古典传统”，以及被他们视为误入歧途的一种“现代传统”。毕竟，“剑桥学派”致力于建构另一种据说完全被忽视了的现代“政治思想传统”，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不少人以为，“剑桥学派”倡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让文本返回它最初的写作语境”，波考克则在2003年纠正说：《马基雅维利时刻》其实“是要探索文本的命运，探索它们在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从16世纪到18世纪，从佛罗伦萨到英格兰、苏格兰和革命时代的北美——的旅程中传递的话语”。可见，波考克并不讳言自己在打造一种政治“话语”的“传统”。他接下来还说，《马基雅维利时刻》致力于刻画“‘共和政体’的形成或奠基成为可能的时刻”及其“在它所属的历史中引发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共和政体深陷于由它所引起或是它必须面对的历史紧张或矛盾之中”。^[50]这听起来就像是说：人类的某种理想政制的实现，不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哪有可能实现。我们在“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史或者儒法斗争史，庶几就类似于这样的史学。在1990年发表的《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一文中，斯金纳明确提出，“马基雅维利无疑是这一传统中最伟大的一个”。斯金纳还告诉我们，如果有谁以为，“限于当今政府在技术上的错综复杂和不可避免的秘密”，复兴“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传统”根本不可能而且不合时宜，那么，这种观点就“错过了问题的关键”。

我之所以要重新审视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并不是因为它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政府将因为实行民治（by the people）而实现民享（for the people）——这仍然需要我们去努力；而仅仅是因为它传达了这样一个警告——尽管它可能过于悲观，但却不容我们忽视：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义务置于我们的权利之上，否则我们必定会发现，我们的权利本身将遭到破坏。^[51]

由此看来，我们的确不能以为，“剑桥学派”提倡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仅仅是纯学术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反对专注于古典文本本身，强调思想史研究应该关注客观的“历史语境”。在2003年的重版“跋”记中，波考克还预告了他正在撰写的部头更大的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为主题的史书：他要赶超吉本。据说，史学撰述（historiography）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构（the construction of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不外乎“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是解释共和国如何变成了帝国；二是坚持‘自由权’（Libertas）和‘治权’（imperium）既不可分割，又相互破坏”。^[52]波考克认为，这两种叙述的基础是“两种自由观”，“大体类似于伯林划分出的‘消极’和‘积极’自由两极”。^[53]波考克清楚告诉我们，他的“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构”针对的是种种妨碍公民共和主义理想的“宏大历史叙事”，因此，他必须

为他自己信奉的激进政治信念提供新的“宏大历史叙事”。如果我们被波考克或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所讲述的他们“觉得值得讲述的历史”迷住,以为这样丰富的学问实在了不起,只能表明我们自己缺乏辨识能力而已。

注释:

[1][3][35][50][53][英]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参见全书,第581、585、582、588页。

[2][英]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

[4]参见 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5][英]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74页。

[6]就复兴所谓“公民共和主义”理想而言,按博耶的说法,三剑客的第三名不是思想史学家邓恩,而是哲学家佩迪特。参见[美]博耶:《论古代共和主义的现代意义》,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7][14]J. G. 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1971, pp.80—147.

[8][9][10][12][13][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英]波考克:《语言及其含义: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92,93,70,71、注释5,64,65,66,68,66—67,70,70,71,72、注释6,73,74—75,75,76,77,79,80,83—85,85,88,91—92页。

[11][美]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15]参见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8.

[36][英]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135页。我国学人对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的介绍,见李宏图的长篇《在历史中寻找自由的定义》(译后记),[英]斯金纳:《自由主义以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09—156页。谁若将此文与佩罗—索希内的《语境中的斯金纳》(见郝兆宽主编:《逻辑与形而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232页)一文对照阅读,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如何思考的训练机会,不少问题也会豁然开朗。

[37][39][40][41][42][43][44][45][46][47][48][英]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105,96,97,90,101,105,131,133,134,107,120页。

[38]洛夫乔伊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形成史上的位置和影响,参见曼努埃尔:《洛夫乔伊再回顾》,贺照田主编:《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8—488页。

[49]纽维尔:《马基雅维利和色诺芬论君主的统治:一个双重的碰撞》,韩潮主编:《谁是马基雅维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51][英]斯金纳:《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68,79—80页。

[52]中译本把 historiography 这个常用词译作“历史拟制”,虽然与其原义差得太远,但用来表达波考克的史学观点倒颇为恰切;史学撰述对于波考克来说就是一种拟制。

[责任编辑:汪家耀]